

XI BEI JING JI SHI

人民出版社

西北经济史

李清凌 著



西北经济史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寿平

扉页题字:蔡美彪

装帧设计:王旭升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经济史 李清凌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

ISBN 7-01-002706-4

I. 西北经济史

II. 李清凌

III. 经济史·中国·西北地区

N.E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2281 号

西北经济史

XIBEI JINGJISHI

李清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甘肃省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兰州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75

字数:383 千字 印数:1-2080 册

ISBN 7-01-002706-4/K·560 定价:24.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比较粗犷的线条,勾勒出西北经济从远古至晚清发生、发展的过程,并对其制约性因素进行了探索。对于举世瞩目的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学界一般认为是由于西部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文化科技落后造成的,本书驻足于西北,认为在诸多因素中,民族矛盾冲突的加剧是导致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主因。全书内容丰富,资料充实,结构紧凑,文字流畅。可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史、西北地方史的参考资料,也是关心西北开发的广大干部群众的必读书。

FJ3P-17

序

杨建新

西北经济史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一个很难写的题目,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李清凌先生写出这样一部书,无疑是对西北地方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贡献。

西北经济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因为西北地区包括陕、甘、宁、青、新五省(区),其面积将近占全国总面积的 1/3,又是古代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主要通道,这一大片领土上的经济发展,反映了历史上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一个侧面,是认识和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西北经济史也确实是一个很难写的题目,因为西北地区从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它政权林立,体制独特,经济发展千差万别,地理条件和环境复杂,农业、牧业均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再加古代中外贸易在这里活动频繁,其经济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均非其它地区可比。更困难的是,有关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历史的记载很少,一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材料,更是凤毛麟角,甚至根本没有。这些都给这方面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作者能克服这些困难,写出一部西北经济史,其精神、其学识都是难能可贵的。

至于说到撰写西北经济史的意义,那更是十分明显的事。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西北地区的发展与沿海地区相比,差距很大,西北地区的发展要想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需要做许多扎扎实实的事情,总结历史上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也应该是其中的

一项工作。西北地区经济的落后,不是现在造成的,而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特别是从唐代中期以后,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滑坡和停滞、甚至倒退的状况。但是,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从来就落后于其它地区,它有过自己繁荣昌盛的历史。从繁荣昌盛到走向落后、停滞甚至倒退,是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的。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以启迪现代,这正是这本书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在为这部书写序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出许多想法,想来想去,最后还想借此机会说说下面几个看法。

西北地方经济史的发展,从总的方面看,离不开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框架和大趋势,但是,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西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特殊因素,西北地方经济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在许多方面与中原和中国其它地区经济发展的轨迹和模式不同。古代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所走的路子,从总体上说是以牧业为主带动农业发展的牧农结合型。

作为西北地区的陕西和甘肃陇东地区,与西北的其它地区不同,是黄土高原农耕区域的一部分,农业发展是很早的,从这块地区经济发展历程看,这里的农业与中原农业文化联系在一起,是我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另一个起点,也是农业文化向东辐射的一个辐射源,它是整个西北地区中,与中原地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部分,因而在经济发展上,与西北其它地区有一定的不同。真正代表和体现了西北经济发展史总体面貌的,是现在的新疆、青海、宁夏和甘肃的西部。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有史记载以来就散布着各种游牧部落,就是以牧业为主,中间夹杂一些小片的农业地区,所谓“用谷量马牛”,所谓“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等,都是古代对西北畜牧业经济发展状况的表述。在这里,畜牧业是维系各族居民的主要生活资料,是支撑这里政治活动和地方政权的主要支柱,是商业、手工业发展的主要基础,是国内外交往的主要环境和手段。同时,这里农业的发展,实际上也是在牧业的带动、支撑、包围中,逐渐发展起

来的,使这里的农业带有极浓厚的牧业色彩。甚至可以说,在古代,西北没有畜牧业的支撑,农业就得不到很好发展,在现代,畜牧业仍然是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伴侣,它们之间有很强的伴生现象。我认为,这应该是西北大部分地区发展经济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自然环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体会最深,但在理论和认识上,往往被忽视。实际上,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之一,是物质和精神生产的基础,它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西北地区的经济就不能不在西北地区自然环境允许的条件之下发展。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较差,寒冷而干旱的气候,广袤的干旱半干旱的山区地带,大片的沙漠戈壁和稀少的地面水源,这些都给经济的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古代西北地区的经济只能是一个温饱型的经济,自我提供发展基础的能力很差。在这样一个地理条件下,天灾当然是不断的,这是大自然的一种自我损害,但是一旦遇到人祸,给大自然造成的损害就更加惨重。从历史上看,西北地区主要是在人祸的影响下,造成劳动力流失,土地沙化,水资源枯竭,水利设施破坏,牧场衰退,商贸中断,破坏了西北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基础,连一个温饱型的经济都难以维持。

西北地区的地理条件虽然并不优越,但它仍然能给西北地区各族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和生产条件,而人们的活动却给予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以重大的创伤,与此相适应,变坏的地理环境也会以更大的反弹力给西北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创伤。这是我们应该记取的一条基本教训。

民族关系是西北社会中的一种基本关系,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直接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西北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各民族本身的开发和勤奋劳动,更重要的是,发展经济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民族关系的环境。所谓民族关系,其实质就是各民族权

利、地位是否平等的问题，就是各民族生存条件、经济利益和文化传统是否得到保障的问题。然而历史上的西北地区，由于汉族剥削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统治阶级的掠夺政策，民族战争、相互侵袭时有发生，牧民不能随季牧放，农民不能安居耕种，造成流民四起，部落离散，给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从汉代一直到近代，主要是由于民族关系失调，西北地区的经济长期处于发展——破坏——恢复——发展的循环之中。而且恢复期愈来愈长，发展期愈来愈短。往往是一场战争和动乱，就使数十年发展起来的生产水平倒退到原来的状况，复苏的经济又陷于萧条，积累起的财富被破坏殆尽，其结果，只是给各民族的发展都带来严重的灾难和损失。所以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是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的条件，任何时候都不能稍有懈怠和大意。

历史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但很值得我们现代人深思和回忆；现代西北地区的社会条件完全变了，但是在新条件下重复某些旧的蠢事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一方面要为我们前人的艰苦创业和辉煌业绩骄傲、自豪，另一方面又要吸取前人的惨痛教训而自勉、自励，我想，这应该就是这部专著的社会作用和作者的本意。

1997年5月20日

于兰大柏斋

目 录

序	杨建新
绪论	(1)
第一章 西北社会经济的开端——远古至春秋	(13)
第一节 光辉灿烂的远古遗址	(13)
第二节 商周时期西北先民的社会经济活动	(21)
第二章 西北社会经济的初步发展——战国秦汉	(32)
第一节 战国秦汉西北地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与经营形式	(32)
第二节 战国秦汉时期的农业改革及其对西北 地区的影响	(44)
第三节 两汉在西北的屯田制度	(61)
第四节 战国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的手工业	(73)
第五节 “丝绸之路”与西北商业的发展	(84)
第三章 各民族政权竞争下的西北经济——魏晋 十六国北朝	(100)
第一节 私家地主所有制和私营农业的发展	(100)
第二节 国家所有制和国营农牧业	(113)
第三节 各民族政权竞争下的手工业	(128)
第四节 各民族政权竞争下的商业	(136)

第四章 西北社会经济的繁荣与衰落——隋唐

五代	(148)
第一节 隋朝对西北地区的经营	(148)
第二节 唐代前期西北农牧业经济的繁荣	(163)
第三节 隋唐前期西北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手工业	(179)
第四节 安史之乱至五代动乱局面下的西北社会经济	(190)
第五节 唐代西北地区的商业	(206)

第五章 各民族政权对峙下西北的区域经济开发

——宋夏金	(217)
第一节 宋夏金时期西北的土地经营与农牧业	(217)
第二节 宋夏金时期西北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手工业	(239)
第三节 宋夏金统治时期西北的官私贸易	(250)

第六章 统一多民族政权下西北经济的缓慢发展

——元明清(上)	(279)
第一节 元朝统一多民族政权下的西北经济	(279)
第二节 明代西北的水利与土地经营	(296)
第三节 明代西北的畜牧业	(315)
第四节 明代西北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手工业	(325)
第五节 明代西北的交通与商业	(338)
第六节 明代西北的茶马互市	(353)

第七章 统一多民族政权下西北经济的缓慢发展

——元明清(下)	(368)
第一节 清朝前期的民族政策和西北安定局面	

	的出现·····	(368)
第二节	移民垦荒和屯田·····	(375)
第三节	清朝前期西北水利建设的成就与农业 生产的发展·····	(396)
第四节	多民族经济体系下的畜牧业·····	(411)
第五节	多民族经济体系下的自然资源开发和 手工业·····	(424)
第六节	多民族经济体系下的商业·····	(443)
尾论	从东西部差距的形成看民族关系的重要性·····	(476)

绪 论

一、西北经济史研究的对象和重点

本书“西北”的概念，系指今日祖国的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不是指历史上某一地方性政权的西北。西北经济史研究的对象，包括西北历代经济活动的环境、内容、产业结构、技术状况、发展水平，经济与政治、文化、军事的相互影响及其传统经验、历史作用等。一句话，西北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西北经济发展的过程及规律。

西北古代社会经济史，是整个中国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包括中国经济的共同特点或共性，又有其自身独具的特点或区域性。在当前，为了适应开发大西北的客观需要，加强西北经济史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阐明西北经济的区域性特点乃是十分必要的。西北经济的区域性特点，主要是西北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历史时期人口相对稀少；多民族聚居；生产方式逐渐落后于内地等。其中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西北经济的进程，因而应该是西北经济史研究和提醒人们注意的重点。

影响西北经济进程的自然因素，是在辽阔的西北大地上，自然地理环境呈现出十分复杂的面貌。这里有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也有低于海平面 155 米的吐鲁番盆地；有平沙无垠的瀚海戈壁，也有沟壑纵横以及刀脊鱼背似的峻岭山梁；它如丘陵、河谷、绿洲、草地、山地……斑驳陆离，奇然伟然，壮观无比。从气候条件看，也是暖温、温润、风沙、干旱、高寒、阴湿，应有尽有，变幻不齐，甚至

一山一岭，顶部是终年积雪，腰间有森林密布，脚下又是百花争妍，集峥嵘峻峭与妩媚于一身，给人以莫名的神秘感。壮丽多姿的山河大地，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资源和生存环境，也从交通到生产条件等方面给人类以种种的困难和考验，尤其在古代人类尚不能统治自然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受自然条件的严格限制和影响。

对于以农牧业立身的西北先民来说，自然条件对社会经济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干旱的威胁上。据我们粗略的统计，从西汉高祖二年（前 205 年）至清中期鸦片战争前的道光二十年（1840 年），共 2045 年间，西北（主要是东部）和全国性的旱灾见于记载的即有 400 多次^①。由于古人生产力低下，物质积蓄较少，丰收尚感衣食不足，一遇旱灾，平地无收，百姓流移陨落，景象是极为凄惨的：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 年），匈奴驻地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疾，死伤大半。

后晋出帝天福八年（943 年），时蝗旱相继，人民流移，饥者盈路。关中饿殍尤甚，死者十七八。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 年），自春及夏，宋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淮南诸路久旱；九月，诸路复旱。时新复洮河亦旱，羌户多殍死。

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 年），宋陕西旱，五谷焦枯，泾、渭、灞、泾皆竭。时秦民以饥离散，壮者为北人所买，郡邑遂空。

元泰定帝泰定五年（1328 年）八月，陕西大旱，人相食。

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 年）八月，陕西州县数月不雨，麦禾俱伤；民之弱者鬻男女，强者肆劫掠。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 年），陕西等处连年水旱，死徙大半，饥民流入汉中、郧阳、荆襄山林之

① 据《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一书统计，农业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

间,食树皮草根。

清高宗乾隆十八年(1753年),甘肃皋兰、河州等十五州县旱,被灾地十六万二千七百多亩。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甘肃皋兰、金县等三十二厅州县卫连年旱雹灾害,民众缺乏口粮籽种。^①

类似记载尽管极不全面,如西域(今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料基本未能收载,又清初几十年西北东部的旱灾记载也很少,与史实不符,但从这些简略的记载中,我们已能看清干旱对西北经济和人民带来的严重威胁。

影响西北经济进程的社会因素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稀少 西汉以前无足够的人口统计资料。西汉以来,据我们粗略的统计: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司隶校尉部之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弘农;益州刺史部之武都;凉州刺史部之陇西、金城、天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安定;朔方刺史部之上郡、北地,以上大体相当于今西北各省区共有1300214户,5036546人,人口密度除京师达到64.4人/平方公里外,其余郡为0.3—11.6人/平方公里^②。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司隶部之弘农郡、凉州之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郡、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酒泉郡、敦煌郡;并州之上郡,以上约当今西北地区,共有319470户,1438242口。各郡属国人口密度为0.1—19人/平方公里。西晋太康初(3世纪80年代),雍州之京兆、冯翊、扶风、安定、北地、始平、新平;凉州之金城、西平、武威、张掖、西郡、酒泉、敦煌、西海郡;秦州之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郡;梁州之汉中郡,共计有176320户。十六国北朝西北人口资料不全。凉州一地,西汉时有9郡,331260户,东汉时有12郡(属国),户数减至

① 以上均见《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农业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②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以下未注出处者,均据此书各表统计,不另注。

102491户,西晋有8郡,30700户,北魏永熙(532—534年)间有10郡,共3274户。以此概观其他各州,人口的减耗确是相当惊人的。隋大业五年(609年)雍、梁二州大体即今西北范围共有34郡、182县、1098769户,每县平均约6037户。唐天宝元年(742年),京畿、关内、陇右三道大致相当今西北地区,共有183县,933634户,5167111口。当时全国人口增长较快,西北人口也赶上和超过了西汉。人口密度除京畿道每平方公里达到46.41人外,其余关内道为3.45人/平方公里,陇右道为0.67人/平方公里。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陕西永兴军路、秦凤路共有1451382户,3898763口,若加上西夏、回鹘及今新疆境内哈刺汗、于阗等民族政权的人口,其总数肯定又超过唐代。元代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共计可统计人口有92651户,802264口,因二省的许多路州府人口统计缺载,均难据以判明人口增减的情况。明代万历六年(1578年),陕西布政使司(包括今陕、甘、宁、青大部分地区)共有394423户,4502067口。清代按道光十——十九年(1830—1839年)各年统计平均数计算,陕西、甘肃二省和巴里坤、乌鲁木齐地方共有2755万余口。这个数字,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西北可统计人口的一至几倍。当时陕西省、甘肃省和巴里坤、乌鲁木齐地方合计面积99954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陕西为63.10人/平方公里,甘肃为31.86人/平方公里;巴里坤、乌鲁木齐为0.66人/平方公里。综上粗略统计,西北历代以那样少的人口,经营如此辽阔的国土,加上工具、技术手段、自然条件等因素都较差,因而人力不济的矛盾一直很突出,这是影响古代西北经济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二是生产方式落后 地广人稀的地区如何有效地进行社会生产?西北先民根据各自所在的自然条件、生产经验和生活习惯,创造性地总结出了半农半牧,农牧结合,一业为主,兼营他业的综合性生产经营模式。具体讲,西北东部居民多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

手工业；西部居民则多以牧业为主，兼营农业和手工业；西部一些农耕条件较差和人口特少的地区，则主要经营畜牧业，附之以简单的手工业，而很少经营农业。畜牧业与农业相比，有利于在更加广大的范围内利用土地、水利等资源，但从一定量土地的生产率来看，则在正常情况下农业单位面积向人类提供的生产物，又远远超过了畜牧业。从实际情况看，古代西北少数民族长期停留在“逐水草而居”的经营水平上，生产相对落后；即使汉族聚居的农业区，也是因为地处边疆，封建王朝在这里驻军防边，需要有充足的军粮供应，因而，从西汉武帝以来，历代封建政府都在这里屯田，以缓解内地转输的困难。屯田是一种军事化的生产形式，它以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将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越是文书契约租佃制普遍推广的时候，屯田的落后性及其造成的生产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越突出。撇开屯田的必然性不说，单就其组织形式的落后性而言，它确实和畜牧业一起，代表着历史时期西北生产关系落后的一面，而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西北经济的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三是民族关系复杂 今天西北的 40 多个民族，多是古代少数部(民)族的后裔。历史上，在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如何处理各民(部)族内部的关系，这些民(部)族之间的关系和这些民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是直接涉及到各历史时期边界安全、边疆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事情。由于古代的中央王朝大都对边境少数民族实行歧视、掠夺的政策，边境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又常常觊觎它族和内地的人口、土地与财富，矛盾激烈的时候，便酿成旷年累代的战争。这里且不论战争的性质、胜败如何，单从社会后果来看，它往往使数十百万人离乡背井，流落失所，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生产。汉武帝元狩二年(前 121 年)，汉将霍去病两次向河西进兵以及元狩四年(前 119 年)，卫青、霍去病率兵十数万再次击败匈奴后，匈奴民众在河西、漠南一带的生产完全废弃。再如东汉政府对

西北羌民的镇压,魏晋十六国北朝各民族上层在西北经久不息的杀伐,隋唐王朝对突厥、吐谷浑的战争,宋夏、宋金的武装对峙,元朝统治者的南下和西征以及明廷对瓦剌、鞑靼的防御,清朝政府对西北各民族上层反叛势力的征伐等等,历代相沿的民族矛盾、民族战争和征服,不仅打乱了西北各民族民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并不同程度地毁灭了西北各民族先民长期积累的文明,而且也加重了全国人民,特别是边界人民的赋役负担。民族矛盾和战争对西北社会经济的干扰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在唐中期以前,其造成破坏的程度稍比中原内地轻一些罢了。

除以上原因外,历代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宋元以后,丝绸之路在中西交流中的重要地位逐渐被海上交通所取代,西北对外联系的渠道越来越狭窄,累代相承的结果,遂使经济社会逐渐由昔日的开放型变为封闭型。这一切,也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应是西北古代经济史研究的重点。

二、西北古代经济史的几个阶段

西北经济史有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为研究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按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经济环境的变迁和社会经济进步的程度等综合性因素考察,将其划分为各具特色的五个阶段,然后从中清理、勾画出经济演进的整体性轨迹或曲线,并找出内在的联系性。

1. 史前阶段 从考古资料所见旧石器时代起到相当于中原夏商王朝的齐家文化晚期,可定为西北经济史的史前期即原始社会阶段。作为这一阶段下限的火烧沟等文化,是西北先民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遗存。这一时期,西北先民的劳动工具以石器、木器、骨器为主,火烧沟文化又包含着以铜器为代表的金属冶制技术的遗迹,说明这一时期西北先民已经向青铜器时代过渡